

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埃及对外关系^{*}

谢立忱 田志馥

内容提要 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个性和共性并存的微妙关系,导致埃及的外交政策长期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两种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的掣肘,从而直接影响埃及的对外关系格局。自纳赛尔上台以来,埃及对外关系大致经历了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到过于赤裸的现实主义,进而到灵活、温和的务实主义三个不同的时期。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影响埃及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在处理埃及利益与阿拉伯利益的关系问题上,纳赛尔过度强调了阿拉伯的责任和统一的义务,萨达特则过于忽视了阿拉伯利益,而穆巴拉克则有效地维持了二者的平衡,这也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外交政策的最成功之处。穆巴拉克通过积极推行全方位“平衡外交”策略,增大了埃及外交的回旋余地,提高了埃及的国际影响力,使其综合国力中的“外交力因素”得到充分延伸,从而使埃及对外关系呈现出一片可喜的景象。

关键词 埃及 对外关系 民族主义

二战后,民族主义开始取代伊斯兰教成为中东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哪一位阿拉伯领导人能够无视它的存在。作为与阿拉伯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和密切利益关系的埃及,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个性和共性并存的微妙关系,以及权衡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孰轻孰重的难题。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处理方式,导致埃及的对外关系呈现出三种完全不同的格局。

一、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的理想主义时期

纳赛尔上台后,开始明显地把埃及民族主义导入阿拉伯民族主义(亦称泛阿拉伯主义)轨道,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埃及意识形态和外交思想的核心。纳赛尔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公开奉行联苏、阿,抗美、以,反英、法的外交政策,从而使埃及对外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

1. 埃及与美、以对抗。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以色列国的诞生,本未对埃及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但在浓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作为阿拉伯盟主的埃及便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埃及最终陷入了与以色列交战的深渊。正如梅厄夫人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埃及没有真正的参战目的——除了抢掠、破坏犹太人建设的一切。”¹然而,此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尚未成为埃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对埃及政府的对外政策仍具有很

^{*} 本文为西北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资助项目(项目号为:08YZZ21)的成果。

¹ [以]果尔达·梅厄著,章仲远、李佩玉译:《梅厄夫人自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

大影响。因而,当时法鲁克国王在是否派遣正规军参战问题上态度犹豫。埃及政府既想履行自己的阿拉伯盟主的责任,又不希望损害本国的利益。这种矛盾心态充分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两种政治思想间的冲突。

与法鲁克国王不同,纳赛尔是一个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重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纳赛尔一上台便开始明显地把埃及民族主义导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轨道,泛阿拉伯主义开始成为埃及对外政策总的指导思想,结果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因素在埃及对以政策中的影响发展到了极致,最终使埃、以间的仇恨发展到不共戴天的程度。

源于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感使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始终站在反以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多次阿以战争的主力,对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而做的斗争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纳赛尔便下令禁止一切与以色列有来往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结果在 1956 年诱发了与以色列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这次战争结束后,鉴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力量的涣散,纳赛尔决定避免在短期内与以色列再次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然而,纳赛尔出于对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感和维护自己在阿拉伯民族中的领袖地位的考虑,加之迫于阿拉伯世界主战呼声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对以色列再次采取强硬态度,封锁亚喀巴湾,并积极备战,并于 1967 年最终引发了与以色列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战争的惨痛损失使纳赛尔开始重新评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所要实现的宏伟目标,以及对以色列的政策。1967 年 11 月 23 日,即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解决中东问题的 242 号决议的次日,埃及便不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宣布予以接受。这说明埃及对外政策中的埃及民族主义因素开始上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赛尔已打算放弃他的整个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而只表明他确实准备更多地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与以色列的冲突。埃及的外交思想核心由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埃及民族主义的最终转变发生在萨达特时期。

在纳赛尔上台之前,埃美关系尽管不是十分友好,却也并非完全敌对,双方关系在政治领域虽无多大建树,但在经济领域的来往倒也颇为密切。然而,纳赛尔日益推行的支持和领导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事业的反帝、反殖、反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美国企图控制阿拉伯国家以填补中东政治真空的新殖民主义迎头相撞,这一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埃美关系不断恶化。纳赛尔认为,美国拼凑巴格达条约组织¹是为了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美国欲继承英、法殖民主义衣钵的新殖民主义。纳赛尔进一步指出:“威胁中东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西方殖民主义。”^④在纳赛尔看来,美国是以色列的后台,它同以色列一样都是阿拉伯人民的敌人。为了同美国拼凑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相抗衡,纳赛尔开始将其长期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统一运动真正开始付诸于实践,与叙利亚、沙特等国分别组建不同形式的军事联盟。美国也针锋相对,在援助问题上对埃及层层设卡,妄图以援助为诱饵控制埃及。由于埃及不肯向美国就范,美国拒绝向埃及提供武器,并取消对埃及阿斯旺高坝工程的援助协议。美埃关系日益恶化。

1956 年 11 月 6 日,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埃及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威望大增。美国不希望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填补英国势力衰落后在中东地区出现的真空,这不仅是因为埃及同苏联的关系愈益密切,还因为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因而美国有的报纸宣称:“中东的真正危险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从大西洋一直伸展到波斯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④美国认为,为了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必须在中东扶植亲美的政权。这样,一向亲西方的以色列

¹ 1955 年由美、英炮制的中东防御体系,通过吸收伊拉克等国家加入,美、英意在建立一条防御苏联南下中东的防御带。该组织主要由伊拉克和英国等国组成。

^④ Gail E. Meyer, *Egypt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mative Years*, New Jerse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9.

^④ 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5 页。

便成为美国大力扶植的首选对象。纳赛尔实行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不仅直接导致其与以色列、美国关系的恶化,而且间接地促成了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伴随美以战略合作的日益密切,尤其是美国在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公然支持以色列,美国公开站在了阿拉伯国家的对立面,埃及宣布与美国断交,两国关系开始跌入谷底。直到萨达特时期,埃、美双方关系才逐渐得以改善。

2 埃及与苏、阿联合。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最终将埃及推向了美、以、英、法等国的对立面。为了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和埃及的国家利益,尽管纳赛尔曾试图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结果却不得不投靠苏联,接受苏联的援助。与此同时,纳赛尔也致力于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整合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力量,以对抗西方和以色列。

20世纪50年代中期,埃、以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以及埃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不睦,使埃及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因而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苏联。对于50年代中期的苏联来讲,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拼凑军事集团以营造遏制苏联的“北层防线”之际,能够在“外线”找到像埃及这样的支撑点,是求之不得的。苏、埃两国不谋而合。1955—1956年售埃武器、援建阿斯旺高坝、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这三件大事,使苏埃关系迅速升温。据不完全统计,1955—1966年间,苏联总共向埃及提供了7.59亿美元的武器装备。¹然而,苏、埃间也并非毫无分歧。除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外,纳赛尔倡导阿拉伯世界统一的泛阿拉伯主义政策也是导致苏埃关系不时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并不希望埃及真正强大和阿拉伯世界实现团结。苏联反对泛阿拉伯主义,攻击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统一政策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但总体上来说,因彼此互有所需,纳赛尔时期苏埃关系的主流仍是友好合作。

为了更好地应对美、英、法等新老殖民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纳赛尔开始将其长期倡导的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泛阿拉伯主义真正付诸实践,埃及与叙利亚、沙特等国分别组建不同形式的联盟,阿拉伯世界内部实现空前团结。1956年初,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三国结成了军事同盟。1958年2月5日,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63年4月,埃、叙、伊(伊拉克)三国经过谈判达成联合的原则性协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纳赛尔推行的泛阿拉伯主义政策,在密切埃及与阿拉伯兄弟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埃及与某些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某些非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紧张甚至对抗。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纳赛尔积极实行支持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中共和派势力的泛阿拉伯主义政策,导致埃及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尤其是与沙特的关系恶化。为了对抗纳赛尔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沙特等君主制国家力倡泛伊斯兰主义,沙埃关系迅速恶化,双方从1957年约旦君主制面临挑战时的恶言相向发展到1962年也门战争中的兵戎相见。当然,事实上,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都同样掩饰着两国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意图。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也把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视为自己谋取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障碍。伊、埃两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而长期相互敌对和相互攻击。尽管如此,纳赛尔时期的阿拉伯国家关系,其主流仍是联合对外,分歧只是支流。相比之下,纳赛尔主张建立一个除以色列外的、包括所有他认为应属于阿拉伯人的领土在内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强调应使海湾阿拉伯化、消灭君主制等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对与阿拉伯国家存在诸多领土争端且始终强调海湾地区“波斯”性的、怀念古波斯帝国荣耀的伊朗君主制民族主义政权构成了更大的挑战和威胁。这样,埃及与伊朗的关系持续恶化。1960年,双方断绝外交关系。1962年,伊朗和埃及都直接介入也门内战,分别支持君主派和共

¹ 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第66页。

和派,从而将双方间的长期“冷战”一度变成经由也门人之手进行的“热战”。直到60年代中期,伴随埃及对外政策中的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埃及同伊朗间的这种激烈对抗才渐趋缓和。

3 埃及与英、法交恶。纳赛尔出于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感而实行支持和领导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因其直接威胁到英、法在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而进一步恶化了埃及与英、法的关系,但却密切了以色列与英、法等国家的关系。为了报复埃及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英、法开始接近以色列并向其提供援助,企图借助以色列来牵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法国,它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武器,¹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以色列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至70年代初,法国仍是以色列一个坚定的西方盟友。^④

二、力倡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阶段

萨达特时期,尽管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影响着萨达特,但与纳赛尔把阿拉伯民族利益看得高于埃及的国家利益不同,萨达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是以服务于埃及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萨达特在埃及民族利益至上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奉行与前任迥异的外交政策,从而使埃及对外关系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

1. 疏苏亲美。萨达特上台后,苏联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为继续保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埃及提出的援助要求很少有求必应,苏埃关系进一步恶化。面对以色列的骄横跋扈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为使埃及脱离阿以冲突的漩涡,收回失地,萨达特决定卸掉纳赛尔时期埃及承担的过多阿拉伯责任,信奉新的政治哲学——埃及民族主义,改变纳赛尔把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同敌视美国相结合的政策,在同大国关系上转向美国。^④萨达特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依靠美国的以色列施加影响的惟一的力量”,“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整个局势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里”。^{1/4}然而,在1973年由萨达特发动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在使处于优势的美国和以色列认识到埃及具有潜在的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之前,在美国真正意识到解决阿以冲突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之前,埃、美之间徒有接触的愿望,两国关系并未取得任何大的进展。

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及阿拉伯产油国在战争中和战后配套使用的石油武器,使美国开始认识到埃及在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利益方面的重要价值。以色列转败为胜完全归因于美国的全力支持的事实,也使埃及更加坚信,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将更符合埃及在中东的长远利益。有鉴于这种认识上的共识,埃美关系随之升温。1974年埃美复交,苏埃关系开始陷于破裂。1976年美国开始向埃及提供军事装备,埃及成为美国受援国中仅次于以色列的国家。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共同面临的威胁使埃美关系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苏埃关系则急剧恶化。到萨达特去世时,埃美关系的发展已使苏埃关系名存实亡。

2 近以远阿。纳赛尔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而萨达特却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与前者不同,在理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后者更加强调权力与现实利益相结合。对于萨达特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实现埃及国家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为了使埃及从阿以冲突中脱身,萨达特在各种国际和平倡议屡遭流产的情况下,于1973年10月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埃及同

¹ 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第193页。

^④ 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

^{④ 1/4} [埃]安瓦尔·萨达特著、钟艾译:《萨达特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83、105—106页。

以色列进行的无休止的争斗,“以战促和”,把埃及的利益置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上。在美国的积极调解和极力斡旋下,埃以最终实现和解,并于1980年2月正式建交。埃以和解使埃及得以脱离阿以战争的泥沼,并获得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埃及这种赤裸的国家利己主义行为,直接导致埃及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冲突,使埃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十月战争之后,埃及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单独与以色列达成军事脱离接触协议,从而遭到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批评。利比亚要求埃及归还十月战争中埃及所使用的利比亚飞机,叙利亚指责埃及的做法是“使叙利亚陷入孤境”的自私行径。伊拉克、巴解组织中的激进派也不断反对埃及与以色列的任何谈判。1977年11月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使埃及与其他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本已恶化的关系雪上加霜,只有摩洛哥和苏丹等少数国家仍对埃及的举动表示理解。1979年3月埃以和约签订后,只有阿曼、苏丹和索马里继续与埃及保持外交关系,其余阿拉伯国家则先后和埃及断交,阿盟总部也由开罗迁至突尼斯,并决定对埃及实行“联合制裁”。与此同时,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也谴责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9年5月在摩洛哥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会议上,埃及被取消会员国资格。同年7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谴责《戴维营协议》¹的建议。总之,萨达特国家利益至上的埃及民族主义政策,在为埃及赢得和平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埃及脱离了阿拉伯大家庭,失去了同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友好关系。

3 埃及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以及美苏冷战的桎梏,致使埃及与西欧国家的关系长期不睦。到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主张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单独与以色列媾和的埃及民族主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埃及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如果说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联合发动的“石油战”,使西欧与阿拉伯国家从原来的对抗、僵持、冷淡走向对话与合作的话,那么,萨达特的和平倡议与媾和实践则为埃及与西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又“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火”。埃及与西欧国家对维护中东稳定、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存在共同利益和需要。1977年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后,欧共体各国外长于当年11月22日齐聚于布鲁塞尔,对“萨达特总统的大胆首创精神”和“在耶路撒冷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对话”表示祝贺与支持。^④埃及政府趁机加强合作关系,争取西欧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埃及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很快有了较大的发展。1977年,埃及和欧共体便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据报道,在埃及1974—1979年间得到的120亿美元外援中,除美国占38%外,其余大部分是西欧国家给予的。^⑤英国、法国已同埃及分别签订价值各达20多亿美元的武器销售协定。法国、西德在埃及1980年的对外贸易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第三位。

三、寻求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之间平衡点的务实主义时期

穆巴拉克总统有着既不同于纳赛尔,又有别于萨达特的独特的政治哲学和外交理念。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既不是纳赛尔,也不是萨达特,我是胡斯尼·穆巴拉克。”^Ⅲ在总结前两位总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为避免出现过分依赖苏联或美国某一方、过度强调或过于忽视阿拉伯利益的情况,穆巴拉克在坚持“埃及第一”原则的同时,努力寻求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平

¹ 1978年9月17日埃、以在美国白宫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统称《戴维营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未来地位以及埃、以实现和平等问题。

^④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6—347页。

^⑤ 逢春:《从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拉克——埃及对外关系的发展》,载《世界知识》,1981年第21期,第4页。

^Ⅲ 万光、陈佩明:《变动中的埃及——来自金字塔下的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衡点,在阿以之间、大国之间积极推行全方位“平衡外交”策略,从而揭开了埃及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1. 阿以间的“平衡外交”策略。穆巴拉克执政后意识到,摆脱因签订埃以和约而在阿拉伯世界备受孤立的处境,是当时埃及面临的一项迫切战略任务。为此,穆巴拉克一方面注意同以色列交往的“分寸”,另一方面注意捍卫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尽力协调埃及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努力寻求埃及国家利益与阿拉伯民族团结之间的平衡,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推行“平衡外交”策略。

为了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穆巴拉克一上任便下令对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攻击性宣传停止回击,并一再强调埃及的“阿拉伯属性”,强调埃及对阿拉伯世界负有毋庸置疑的责任和义务。埃及不仅主动缓和与利比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关系,努力修复与约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传统关系,积极促进约、以和谈,而且常常站在阿拉伯的立场上,勇于谴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损害阿拉伯国家利益的强权行为。正是在穆巴拉克总统的这种不懈努力下,埃及不断改善了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关系,逐渐赢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认同和赞赏。1989年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和埃及恢复了外交往来,同年埃及重返阿拉伯联盟。冷战结束后,埃及不仅继续主动改善和加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反对国际霸权,捍卫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而且常常从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安全和稳定的愿望出发,通过调解和斡旋,积极解决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矛盾,努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得到确认并不断加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愈益密切。

在对以色列的问题上,为了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同时缓和与阿拉伯兄弟国家的矛盾,避免触及阿拉伯世界和国内的反以情绪,埃及的原则是既不破坏埃、以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又不完全与以色列发展全面关系,而是尽力使埃以关系保持一种冷漠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埃及对以色列在阿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野蛮行径屡屡指责。穆巴拉克上任后,坚持在中东事务中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在阿以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埃及完全停止了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公开谴责以色列的入侵,“冻结”埃、以正常化进程。2002年3月至4月,以色列军队以反恐怖主义为名,逮捕了数千名巴勒斯坦人。穆巴拉克公开指责以色列军队滥杀无辜的野蛮行径,暂时中断埃、以两国之间除了有利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渠道之外的一切政府联系。

其次,埃及对于与以色列的政治交往冷漠。虽然以色列总统、总理频繁访问埃及,但穆巴拉克坚持不访问以色列,称“会晤将在条件成熟和有益于真正对话时举行,会见应切实准备以确信它将产生积极成果”。¹ 1982年以后,穆巴拉克再也没有会晤过贝京,且一直拒绝会晤以色列总理沙米尔。除外交、石油、旅游部长外,埃及其他部长均被禁止访问以色列。此外,埃、以两国之间的议会交流也十分有限。另外,在拉宾和巴拉克执政时期,拉宾、巴拉克与以色列其他高级官员曾多次访问埃及,但埃及官员常常先接受访问以色列的邀请,又在最后一刻取消。对埃及的这种冷漠,以色列前驻开罗大使埃弗雷姆·都威克曾描述道:“赴以色列仍需签证,实际上没有埃及人被允许去以色列。只有经过筛选的以色列个人被邀去开罗,对以色列外交人员的抵制很常见。反犹太人、反以色列宣传比比皆是。”^④

最后,埃及对于与以色列的经济交往不热心。以色列驻开罗使馆开馆不久就建立了旅游办公室,但埃及一直未在以色列设置旅游办公室。埃及限制其公民赴以色列旅游,对赴以色列旅游设有

¹ ④ Ephraim Doweik *Israeli-Egyptian Relations 1980-2000*,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Ltd, 2001, p. 156-116.

繁琐的手续。对与以色列的贸易,埃及也持消极态度。埃及建立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对以进出口审核程序,法律禁止国有企业同以色列进行贸易或商业联系。

埃及在阿以间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致使埃以关系长期停滞不前,形成了所谓的“冷和平”状态,但客观上却有力地促进了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但“埃及第一”的原则决定了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即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决不能以破坏埃、以间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代价,埃及的对以政策和对阿政策都是以实现埃及的民族利益为根本宗旨的。

2 在大国间的“平衡外交”策略。穆巴拉克在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二者关系认识上的转变,既突出强调埃及民族主义,同时兼顾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埃及实行“平衡外交”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没有穆巴拉克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就不会有埃及的“平衡外交”策略。穆巴拉克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埃及对阿、以的政策上,也表现在埃及对大国关系的调整上。事实上,埃及在阿、以间的“平衡外交”策略与在大国间的“平衡外交”策略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穆巴拉克上台后,出于既能够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与支持,又可以保持埃及的独立与自主,同时又能维护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的考虑,在对大国的关系上做了一些调整,即在继续保持埃、美“特殊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同苏联、西欧国家、日本、中国等大国的关系。

妥善处理埃及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是穆巴拉克政府外交中最重要的环节,美国在维护埃及的经济、政治及安全利益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替代的。1981年10月穆巴拉克继任埃及总统后,声明埃及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埃、美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在地区问题上埃及尽量与美国保持协调,帮助美国解决美国不能单独解决的国际问题。同时,埃及也努力在独立、自主的外交基点上与美国抗争,保持埃及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地位和形象,维护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坚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既可以避免伤害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感情,又可以突出并提高埃及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战略价值,从而保证美国对埃及的大量援助和支持。自1975年以来,到1995年美国已向埃及提供了近190亿美元的援助,仅次于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¹ 纵观埃及的外交历程不难发现,穆巴拉克总统对埃美关系是相当重视的,自1982年首次访美以来,穆巴拉克已造访美国白宫30余次。2000年3月,穆巴拉克访问美国之前,他的政治顾问巴兹对记者说,全面加强和巩固埃美友好关系是埃及利益的需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也离不开埃及的支持。^④

为了进一步扩大埃及外交的回旋余地,更好地摆脱美国的控制与束缚,埃及积极发展同苏联、中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关系。穆巴拉克指出:“我们应该同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国家保持平衡关系。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能忽视它。”^(四) 1983年苏、埃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松动,1984年两国重新互派大使。1990年5月穆巴拉克总统访问苏联,标志着苏埃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埃及认为,在超级大国之间实行“平衡外交”策略,不仅有利于中东形势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埃及摆脱美国的束缚与干涉。苏联解体后,埃及仍注重发展同苏联的主要后继国俄罗斯的关系。2001年4月26—28日穆巴拉克总统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穆巴拉克在实施“平衡外交”策略的同时,深刻意识到欧洲在埃及外交中日渐增强的份量。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即选择了欧洲,1989年访问欧共体所在地,使埃及与欧共体国家的关系迅速升温。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形势推动

¹ ④ ④ 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第101、106、103页。

下,埃及和欧盟的关系进一步升温。1997—1998年度,埃及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82.99亿美元,大大超过同期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50.38亿美元)。¹ 1999年6月21日,埃及与欧盟签订了消除贸易障碍的协议。除经济合作外,埃及也积极谋求加强和欧洲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埃及和欧盟的政策共同点更多,双方都不满美国在巴、以和谈上的双重标准。中国和日本是埃及致力于开展多边外交的两个重要亚洲国家。埃中关系一向友好,在国际事务中,双方互相支持,尤其是在中东问题上,两国存在诸多共识。冷战结束后,两国高层互访日益频繁,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历史上,埃日关系长期发展平平。1983年,穆巴拉克总统访问日本,双方在经济合作等领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990年日本首相第一次出访埃及。在穆巴拉克“平衡外交”策略的引导下,埃、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无疑是影响埃及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纳赛尔、萨达特及穆巴拉克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孰轻孰重的不同定位,直接导致埃及形成三种迥异的对外关系格局。三位总统权衡和处理问题的实质区别在于对“度”的不同把握。要适度,不能过,平衡是适度的表现。适度的要旨在于,要善于在两极之间进行调适,以保持平衡。在处理埃及利益与阿拉伯利益的关系问题上,纳赛尔过度强调了阿拉伯责任和统一的义务,萨达特则过于忽视阿拉伯的利益,而穆巴拉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有效地协调了二者的矛盾,巧妙地维持了二者的平衡,这也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外交政策的最成功之处。穆巴拉克通过积极推行全方位“平衡外交”策略,增大了埃及外交的回旋余地,提高了埃及的国际影响力,使其综合国力中的“外交力因素”得到充分延伸,从而使埃及对外关系呈现出一片可喜的景象。

Abstract Due to the coexisting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 between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the contradictory Egyptian nationalism and Arab nationalism have been constraining Egypt's foreign policy for a long time. Since Nasser came to power, Egypt's foreign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from unpractical idealism to blatant realism, and finally to flexible and moderate pragmatism. Undoubtedly, nationalism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it. While Nasser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unification of the Arab world and Sadat took an otherwise blind eye to it, Mubarak effectively kept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The overall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Mubarak actively pursued not only expands Egypt's diplomatic maneuvering room, but also increases Egypt's diplomatic influence in the world.

(谢立忱, 讲师,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临汾, 041004; 田志馥, 实习研究员,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州, 350007)

〔责任编辑: 吴家多〕

¹ 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第107页。